

**折中与融合：
论南洋诗宗邱菽园对袁枚性情诗学的继承与改造**

郭联福、潘碧华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摘要

袁枚和邱菽园分别是两个不同时代与地区的诗坛领袖；袁枚在乾隆（1736—1795）、嘉庆（1736—1820）年间率领中国内地诗坛，而邱菽园则在光宣（1875—1908）、宣统（1909—1912）之际引领新加坡诗坛。邱菽园既是袁枚性情诗学的继承者，又是改造者。他与清代中期以来复古、革新两大体系的诗论都有所接触，对双方的优缺点都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论诗重性情，也重诗教；在诗学摹仿与创新问题的看法上，也将两者置于同等地位，形成了具有“折中”与“融合”特色的诗论。通过对其“折中”与“融合”特色的探讨，也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袁枚性情诗论在新加坡传播与影响的认识。

关键词：邱菽园、袁枚、性情、五百石洞天挥麈、马华古典文学

Eclecticism and Convergence: On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Yuan Mei's Poetics of Disposition
by Forebear of Nanyang Poetry Khoo Seok Wan**

KEOK Lean Hock & FAN Pik Wa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Yuan Mei and Khoo Seok Wan were poetic leaders in two different eras and regions. Yuan Mei led the Chinese poetry community during the Qianlong (1736-1795) and Jiaqing (1796-1820) periods, while Khoo Seok Wan led the Singapore poetry community during Guangxu (1875-1908) and Xuantong (1909-1912) periods as well as early years aft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Khoo Seok Wan was not only the successor to Yuan Mei's poetics of disposition, but also the reformer. H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poetic theory of the two systems of retrospection and reformation since the mid-Qing Dynasty. He also ha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both sides. Therefore, his discourse on poetry focused on both dispositional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of poem. In the view of the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oetry, he also regarded both as equally important. Thus, he formed a poetic theo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lecticism" and "convergenc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eclecticism" and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help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Yuan Mei's poetic theory in Singapore.

Keywords: Khoo Seok Wan, Yuan Mei, poetics of disposition, "Wu Bai Shi Dong Tian Hui Zhu", Mahua Classical Literature

一、前言

中国清代政治自嘉庆年逐渐混乱，光绪以后更转为衰世，内忧外患，终于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以中国败战而告终。清廷和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之后，导致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进程加快，民族危机愈益严重。王英志在《袁枚性灵派在近代的影响》里说，“忧国忧民之士皆欲挽狂澜于既倒，但在思想界却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欲以传统的儒家经术为救世药方，另一种是欲以改良为强国利器”¹。当这些反映在诗学上时，前者主张以文艺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反对嘲风弄月的诗歌审美情趣，于是袁枚（1716—1798）的性情诗学被视为异端邪说，予以严厉批判。尽管袁枚的性情诗学不乏批评社会的功能，但却遭到非议者排斥，认为其诗文内容空洞，辞藻华而不实。然而，后者则能够配合时代需要汲取了袁枚性情诗学的精髓，并予以改造。

汲取性情诗学的人，除了龚自珍（1792—1841）之外，属于中国海外代表人物应当首推新加坡诗坛开山祖师——邱菽园（1874—1941），名炜菱，字萱娱，号菽园，又号绣原、啸虹生、星洲寓公等，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漳州海澄县（今为厦门海沧新垵村惠佐）。举光绪二十年（1894），次年移居新加坡迅速表现出侨领本色。移居新加坡初期，他出版了几部诗文集，如：《菽园赘谈》、《壬辰冬兴》、《庚寅偶存》、《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而书写于1898年的《五百石洞天挥麈》，多对袁枚性灵诗学有所引用与批评。石玲在《袁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提及，“在厌薄袁枚成为风尚的情况下，对其持有中肯之见的人还是有的”²，而邱菽园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邱菽园的诗人身份不再像上个世纪的袁枚那么典型与传统，他具有报业、政治、经商等复杂的诗人身份。这一时期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均“从传统的应酬唱和之作，转变成为面向大众的公共言说方式，从庙堂、沙龙走向大众，从教化转向启蒙”³，其中更表现出徘徊于师古（摹仿）与从今（创新）之间的矛盾特征。诗教与性情、摹仿与创新的关系开始成为光宣、民初之际诗论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本文将围绕诗教与性情、摹仿与创新这两个方面来具体探讨邱菽园对袁枚性情诗学的继承与改造。

二、诗教与性情

袁枚逝世百年之后，邱菽园成为其派诗学的继承者与改造者。他在诗坛由以唐或宋为单一宗尚向唐宋兼融转变的总体趋势下，对性情诗学有过调

¹ 王英志：〈袁枚性灵派在近代的影响〉，《文史哲》，1998（4），第79页。

² 石玲：〈袁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99（2），第138页。

³ 陶丽萍：〈多维空间下的历史性建构：现代传播与诗人身份的确定〉，《江汉论坛》，2007（7），第117页。

整。比如，他在坚守唐诗正统的基础上，也适度接受了宋、元、明代的优秀诗歌，取法范围比袁枚更加广泛。他认可诗歌的教化作用，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诗教在新加坡早期诗坛的发展，并与注重表达诗人真性情的特色融合为一。1895年，21岁的举人邱菽园在初次会试落第后，就远赴新加坡，弃仕从商，还主持自创的诗、文社，以性情诗学倡导后进，以与上个世纪袁枚领导的性情派为楷模，“对新加坡诗坛的构建带来一定的铺垫作用”⁴，更对南洋诗学走向影响颇大。

邱菽园与袁枚两人在论诗上存在差异，首先体现在对诗教与性情主次关系的处理上。袁枚生活在“乾嘉盛世”，他的诗歌倾向于注重诗人真性情的表现，对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影响也比前期更为突出。一般而言，儒学型诗人多注重诗教，而以袁枚为代表的诗人则非此典型类，比较重视性灵。袁枚倡导性情论，首重写出自己的真性情，认为：

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⁵

就强调直抒个人遭际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明显忽视诗教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比如他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并认为：

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⁶

除此之外，他也认为沈德潜的格调说，难免有学古不化之弊。袁枚提倡的性情论，其理由之一是为反对当时诗风过度推崇诗教与格调而书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格调派的缺点有所纠正。但有一点应该看到，“袁枚为纠正格调派诗歌之失，而过度推崇诗人的性情，认为只要具备性情，就可以写好诗歌，到最后反而导致诗歌容易流于轻佻与低俗”⁷。性灵派后人多片面地效法与继承了其为“情”独尊的一面，而显然的，邱菽园透视了这一点，即对于诗论的需求不再是单一化，而是追求折中、融合型的诗论。

邱菽园论诗则首重诗教与性情的统一性，其《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一已明示：

“温柔敦厚”诗之体，“兴观群怨”诗之用，此八字被老生常谈，已成口头禅语。苟细思之，千古作诗、谈诗者，又谁能舍此八字立脚？⁸

⁴ 谭勇辉：〈南洋华人诗坛发展史的重要基石：邱菽园和他的“诗话三部曲”〉，《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七辑下卷）》，2014（2），第163页。

⁵ 袁枚著、陈君慧译注：《随园诗话》，北京：线装书局，2008，第155页。

⁶ 袁枚著、陈君慧译注：《随园诗话》，北京：线装书局，2008，第239页。

⁷ 龙野：〈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第123页。

⁸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续修四库全书》（17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69页。

又云：

骤语以温柔敦厚，或入未必能解；一语以兴观群怨，或又无不能解者。先辈谓初学古文辞，宜从论辩类入手；学诗宜从五、七古入手，亦惟其与兴观群怨之旨相近。⁹

卷七亦云：

古往今来，名辈踵出，不相袭亦不相掩，要知人各有我，我能认定我之面目、我之性情，处处还他个实在，则古人不能我轧，反为我用矣。¹⁰

在邱菽园看来，只有根柢于诗教和性情，诗歌才不会沦为轻浮。重诗教当先博学经史，然后以性情为之，这种主张既有继承了传统诗教的“文以载道”，又是重视受正统观念轻视的抒情性，与近代诗学走向密切有关——邱菽园就是早期诗界革命运动的代表诗人。同时，这也是针对性灵派的刻意求异（即“不生而乃病熟”¹¹者）与格调派的拟古不化的弊病而发的。当然，邱菽园和袁枚一样重性情，但对诗教（格调）也同样看重，他“尝语人曰：‘古今言诗者，性情、格调而已’”¹²。简单而言，格调派重诗教，而性灵派重性情，这两者在袁枚手上是严格对立的，但来到邱菽园的笔下时，却有着鲜明的折中性与融合性。这些均表明邱菽园重视诗教与性情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将诗教与性情赋予同等位置，与袁枚的性情为首、诗教为后的主张明显不同。

三、摹仿与创新

其次，两人对摹仿与创新的取法也不同。袁枚的创新说源于诗主性情之论，注重个人性情独特的创新表现，这可从他在与沈德潜论及诗歌发展史时看见：“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¹³。认为因为唐人发展了汉魏诗歌，所以变成了唐诗；因为宋人开拓了唐诗，所以变成了宋诗。各代诗歌都是在顺应诗歌求变的发展过程中，而积极求变，才别开生面与独具特色的。显然的，袁枚有意识地强调了这种“创新”，坚决反对过于遵守传统诗教传统中的作诗规范，容易导致抄袭的弊病。而这一观点，被邱菽园转引在《五百石洞天挥麈》里，卷七云：

抱杜尊韩，附会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病也。¹⁴

⁹ 同注 8，第 69 页。

¹⁰ 同注 8，第 180 页。

¹¹ 同注 8，第 150 页。

¹² 同注 8，第 209 页。

¹³ 袁枚著、陈君慧译注：《随园诗话》，北京：线装书局，2008，第 132 页。

¹⁴ 同注 8，第 171 页。

但是，忽略对前人的学习，也是不可能的，创新总是需要建立在对传统诗学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袁枚过度强调自我，抛弃前人的诗学规范，邱菽园遂有“作文之法必因今而求古”¹⁵之论，对其见解加以申辩。他首先认同“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的观念，基本上接受了袁枚对“诗中无我”之弊的批评。但是他同时也指出，“摹仿与创新”在不同阶段的诗歌创作中起着不同作用，所以不可一概而论。第一阶段的摹仿与创新是：

初学诗宜从五七古入手，亦惟其与兴观群怨之旨相近。¹⁶

此种诗学是初入诗门时必经之途，亦统一要求，无人能豁免。第二阶段的摹仿与创新则是“与夫性之所近，力能勉之而已”¹⁷，此阶段的摹仿与创新主要指导的是，对于哪一类型的诗歌体裁创作适合于让自己的才华与优势得以完全地发挥与展现出来，要有足够的洞悉与把握能力。而第三阶段的摹仿与创新是优先学习诗之人，并非人之诗，即：

不知学古人者，非徒学其辞，尤贵学其人。其人之风节可学也，品诣可学也，出处进退可学也，凡此者皆性情之见端也，皆其人之真。¹⁸

最后，即第四阶段的摹仿与创新是“古人不能我轶，反为我用”¹⁹，此种摹仿与创新已明确要求诗人必须达到“出其藩篱”²⁰的作诗境界。对邱菽园而言，学习前人诗歌，务必达到超越的水平。比如，在评对白居易学有所成的苏轼时得以看出：“宋苏公一出，后人乃并称白苏，可谓千古定论矣”²¹。另评以杜甫为学习对象的两位明清之际的著名诗人——屈大均《读荆轲传》和顾炎武《杜曲谒杜子美先生祠》：

屈、顾二公诗学皆从杜出，其一种悲凉、肮脏之意，早已相视而莫逆矣。²²

类似批评还有很多，不外乎注重要与古人不同，对他们诗歌进行创新，写出属于自己的诗歌。

¹⁵ 同注 8，第 95 页。

¹⁶ 同注 8，第 69 页。

¹⁷ 同注 8，第 78 页。

¹⁸ 同注 8，第 206 页。

¹⁹ 同注 8，第 180 页。

²⁰ 同注 8，第 78 页。

²¹ 同注 8，第 94 页。

²² 同注 8，第 69 页。

四、结语

以上就邱菽园与袁枚诗论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尽管两人的诗论思想颇为接近，甚至可以说邱菽园继承了袁枚的部分观点，但是他并非“性情论”的倡导人，因为整体而言，他应归属“折中”型的诗论体系。他自谓：“余好模棱，余故举性情以一之”²³。对于邱菽园这种折中的论诗态度，无可厚非的，与当时诗坛风气有关，即维新早期以来，在整合前期诗论上，在诗教与性情、摹仿与创新之间寻求辩证关系的近代诗学之影响下，能够从中国诗论发展史的宏观角度进行全面观照，严谨处理各种主流诗学观点的优缺点，既不分界唐宋，也力破门户之见。所以，邱菽园不仅继承了袁枚性灵诗学的一些观点，还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将之与其他清代诗派，如：格调派诗学有效地融合起来。

²³ 同注 8，第 206 页。

参考文献

- 龙野：〈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第122—127页。
-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续修四库全书》（17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石玲：〈袁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99（2），第137—142页。
- 谭勇辉：〈南洋华人诗坛发展史的重要基石：邱菽园和他的“诗话三部曲”〉，《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七辑下卷）》，2014（2），第162—174页。
- 陶丽萍：〈多维空间下的历史性建构：现代传播与诗人身份的确定〉，《江汉论坛》，2007（7），第117—119页。
- 王英志：〈袁枚性灵派在近代的影响〉，《文史哲》，1998（4），第79—85页。
- 袁枚著、陈君慧译注：《随园诗话》，北京：线装书局，2008。